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By HENRIETTA HARRIS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viii, 207 pp.**

「1925年11月25日，劉大鵬從他小女兒的哭聲中醒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夢醒子：一個男人在華北農村的生活，1857—1942》從一個平凡的早晨開始講述前清舉人劉大鵬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劉大鵬是孝子，是九個子女的父親、七個兒孫的祖父，是塾師、煤礦經理，是一個貧窮的、為生計操勞終生的老農；也是縣議會議長、執著地堅守着孔孟之道的紳士，一個五十年如一日筆耕不輟、留下了數百卷日記和著述的著者。

對「寫作」這個行為本身的分析是作者成功理解劉大鵬及其時代的第一步。劉大鵬在1891年左右開始書寫日記，這時候他是一名在太谷縣富商家中坐館的塾師，鬱鬱不得志。這樣的開始是再平常不過的了，不平常的是他將這種寫作堅持了五十餘年。也許一開始是受到了曾國藩日記的影響和激勵，他把寫日記作為反躬自省、實踐聖人之道的工具，或者是練習寫作和書法的途徑。但是當時間流逝、歲月沉澱，寫作本身成為生活中不能改變的一部份，日記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記錄日常的生活。劉大鵬一生的著述是數量驚人的，除了五十年的日記以外，大約還有263卷的文集、詩集及《晉祠志》等等。這些文字寫在各種各樣的紙張上：如報紙、訃告、藥店廣告紙。這種執著的寫作是不能用個人的愛好來簡單解釋的。作者在書中說，我們過去認為日記是作者寫給自己看而著作是寫給別人看的這種觀念，在劉大鵬那裡是不存在的。那是一個文字和寫作本身就具有崇高價值的社會，寫作不僅給一生中大部份時候都被沉重的失落感所困擾的劉大鵬一種宣洩和安慰，而且也成為他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的方式：通過不斷的寫作、在寫作中表達自己，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陶淵明式的隱士，一個從功名利祿的世俗夢境中清醒過來、以踐行「誠敬」這個儒學中核心的道德觀念為真實生活的「夢醒子」。

作為儒家學者的劉大鵬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儒家學說和它所倡導的價值觀念、禮儀已經統治了這個國度和社會長達千年，對於儒家經典的研習和相關的考試是促成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和進入統治階層的不二法門，在劉大鵬出生的時候這樣一套由儒學建構或標榜的系統看起來還非常穩定，但是在他去世的時候它已經分崩離析；作為儒家學者的劉大鵬又是生活在這樣的一

個環境之中：他的家位於一個以造紙業為主的手工業村莊中，清代山西商人在全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建立的商業網絡所吸收的巨額財富，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於商業和財富的推崇，影響到包括劉大鵬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的生活，但是這樣一種商業的強勢卻正在因為國內的動亂、國際政治格局和貿易路線的轉變而走向衰退。劉大鵬的父親與許多商人一樣，是將送劉大鵬讀書作為一種投資在經營的。但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中，劉大鵬成了秀才，卻只能擔任地位低下的教書先生；他中舉進京會試，卻因為書法不佳，更因為不了解日益流行的西學而名落孫山；最後隨着科舉制度的廢除，劉大鵬想通過考試進入國家官員序列的夢想徹底破滅了。作者深入細緻地描述了在這個過程中儒家學者劉大鵬的觀感：他對於自己身為一個貧窮的教書匠所感到的屈辱、他在赴京應試途中因為受到優待而體會到的榮耀、他在搭乘火車時感受到的便利等等。最後作者認為，劉大鵬並不是沒有看到現代化為政治、社會和學術帶來巨大變化，不過這次最能夠讓他開闊視野、認識西學的京津之行與其說帶給他什麼全新的衝擊，不如說他仍然是以自己過往的經驗和當時的考慮來進行認知的；他所交往的也不是那些來自遠方的、擁有本質上不同思想的人，而是那些與他背景相同、態度相同的人。因此，儘管經歷了近代中國無數驚天巨變，但是劉大鵬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隱居在儒家經典的倫理話語中的「夢醒子」。

正如作者在書中數次提到的，對於「夢醒子」劉大鵬來說親人之間的天倫之樂和許多平凡的生活場景帶給他最多的歡樂和滿足感，而自己在科場上的屢屢受挫也被他認為是對於父親最大的不孝。就像「誠敬」的概念主導了劉大鵬對於儒家經典的理解和在現實社會中的立身原則一樣，劉大鵬的家庭世界也是用一個儒家經典中的核心概念支撐起來的，這就是「孝」。書中，「孝」這個抽象概念是被置於赤橋劉家這樣一個具體的地方和家族情境中來分析的：在赤橋這樣一個移民比重相當高的手工業村莊中，宗族的形態很不發達；相反姻親關係所建立起來的紐帶卻非常重要，因此「孝」的觀念不僅適用於以父子為核心的關係中，同樣對已出嫁的女兒也有期望和要求。並且，書中對於「孝子」劉大鵬的分析所展現的也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對這個原則的敦行，同時作者還揭示出「孝」這個觀念在實踐中的多樣性和矛盾性：地方傳統要求在喪禮中舉行佛教儀式來表現孝道，這與劉大鵬所接受的儒家教導相違背；他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從這個問題的解答所引發出來的是對一個更寬廣的學術觀點的反思：我們通常傾向於強調精英的行為模式如何教化或影響了社會的低層，但是劉大鵬的著述和實踐所表現出來的卻

可能恰恰相反。

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中的首鼠兩端、背信棄義以及此後為應付庚子賠款而實行的增稅政策，讓劉大鵬對政府感到失望和憤怒。1905年清廷終結了科舉制度，這尤其被認為是對於儒家價值體系的徹底背棄。對於像劉大鵬這樣半生都為科舉制度奮鬥的人來說，這不僅意味着不再可能成為國家官員，而且直接威脅到他以教書為生計的職業選擇。但是新式教育的推廣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所需要的昂貴的經費讓政府和百姓都不堪重負：新式教育讓地方的受教育率明顯下降，並且教育資源越來越集中到城市裡，鄉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被犧牲了。雖然1911年的革命本身看起來更像是一次軍事政變，但是它此後所導致的山西地方的變化卻的確是一場革命：山西經濟的支柱——銀行業和遠程貿易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閻錫山開始了對山西長達26年的統治，並承諾繼續推行現代化、民主化。這些對於我們故事的主角劉大鵬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轉折，一方面是家族原來在太谷縣經營的傢具店因為太谷銀行業的衰落而大受影響，而劉大鵬亦最終失去了教書的職業，及後在新式縣學的執教，也因為拿不到工資即在六個月後終止了，因此他只能回到赤橋，並在那裡度過了此後大部份的歲月。另一方面，新建立的所謂共和的政體卻為劉大鵬參與地方事務提供了另一條途徑：在1909年他就是新成立的省諮議局議員，1912—1913年他成為縣議會的議長。劉大鵬這段時間的日記為我們展現了當時縣議會選舉和袁世凱君主立憲制表決的實況。作為「人民代表」，劉大鵬的確常常為他周圍的普通人說話，表達他們的意見，這是因為他自己窮困的處境其實與他的鄰人沒有太大差別。但他的威望是很脆弱的，他並不富有，唯一的權威來源是他所受過的教育以及他作為一個儒家紳士的品行，但是這兩者都被民國的新的價值觀念嚴重破壞了。

雖然全書為我們展現出來的劉大鵬更像是一個生活在儒家道德規範裡的老人，但他絕不是不知變通的迂腐儒生，作為「商人」的劉大鵬表現出來的投資熱情讓我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在新的村鎮投資開設了新的傢具店；在一個大型煤礦中他受託管理賬目，並且最終成為投資者。但是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寫的、也許也是劉大鵬在日記中表現出來的，他的商業活動無一不和他作為儒家學者的身份密切地交織在一起：人們之所以信任他是因為他是一個誠信、公正的人；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也會有人因為他令人尊敬的威望而施以援手；當然有的時候這種幫助可能有更為現實的考慮，劉大鵬在縣商會、清查財政公所等機構裡的職位也許對這些煤礦有利。劉大鵬本人更是把自己的商業活動與一貫的道德價值觀和儒家理想聯繫起來：他多次在財產

糾紛中充當中人的角色，在任縣議會議長的時候，相當一部份職責也關乎金融和會計，每一次可能出現的計算錯誤都被他認為是對自己名譽和道德正直的損害，而使他非常緊張。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眼裡，礦區的生活正是他所嚮往的桃花源。當然作者告訴我們，民國年間的山西煤礦業絕非劉大鵬描述的那樣美好：爲了應付戰爭和國家現代化的開支，煤礦被徵以高額的稅收，政府對於機械化大型煤礦的扶持打擊了小型煤窯，而前者又因爲投入過大和技術問題往往難以盈利。最後鄉村工業在度過了一戰期間短暫的繁榮時期以後，迅速地衰敗下去。劉大鵬也不得不完全回到土地上，成爲了農民。

即便在崇修書院攻讀科舉或寓居教書期間，劉大鵬偶爾回家時也會參與田間的勞作。在徹底失去了教職以後，他雖然經理煤礦並且擔任一些公職，但是至少有一半時間需要務農。1926年左右，劉大鵬大約擁有6畝土地，其中既有水澆地，也有部份旱地。這對於要養活他一大家子人來說，的確捉襟見肘。而且由於劉大鵬的幾個兒子都在外教書或工作，在大部份時候，家裡的勞動力主要是已經年屆古稀的劉大鵬和兩個還未成年的孫子。老年的劉大鵬似乎終日都在田間地頭忙碌。自稱「老農」的劉大鵬雖然有時感到疲憊，但是卻覺得這是實踐孔子「耕讀」教導的一部份，並且爲自己的勞動能夠供養一家人感到驕傲。作爲一個農民，他更關心雨暘時令、更關心晉祠分水的傳統和制度，他留下了大量有關祈雨和廟會的紀錄。但是作爲一個正統的儒士，劉大鵬認爲只有功德和誠心才能求得雨水，而不是無稽的儀式，所有異常的天象都被他認爲是上天對於人們道德敗壞、背棄聖人之道的報應。而且因爲他的貧窮，他無法進入地方控制分水和灌溉的權力結構中去，他從來沒有擔任過閘長或渠長，也沒有看到過象徵着權力和利益的水冊，《晉祠志》中的有關記載都來自於他的觀察。同樣，作者對於「老農」劉大鵬的敘述，也涉及到了更廣泛的鄉村社會的其他方面，包括一些有關水的民間傳說。作者認爲在當地有關水的各種事例裡，與其說他們把水定義爲一種自然資源，不如說是一種財產，對於它的不公平分配被認爲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在農業因爲戰爭、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等原因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以後，政府推行的現代化政策，進一步加深了城鄉之間的分野，工業和商業越來越集中到城市的周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裡出現，貧窮的農村卻無力跟上這種改變；相反，國家現代化帶給農村的巨大壓力更加強化了傳統的結構，例如賽會等活動的支出大大增加。

劉大鵬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是在對食不果腹的擔心和對日本佔領的憂憤中度過的，衰老的他與他終生堅守的信仰和道德體系都漸漸地被村民和家庭

所遺忘。1942年劉大鵬懷着對於這一年風調雨順的憧憬而去世。但農村的衰敗、現代化對於城鄉關係、道德秩序和價值體系的改造遠沒有停止。在這個過程中，是政治決定而不是地理因素讓一些地方成爲了中心、另一些地方變成了邊緣。赤橋、乃至整個山西都在這場現代化運動中經歷了一個被邊緣化的時期，雖然現在的赤橋已經越來越成爲擴張的太原城的一部份，而不再會是一個農村。作者在最後感歎，20世紀以來，在這樣一場由現代化國家所推動的巨變中，被深深捲入其中並付出巨大代價的人民是無奈的，沒有人注意過他們的想法和意願。

在傳統以歷史人物爲主體的研究中，劉大鵬這樣的對象會讓我們遭遇一種困境或質疑：他雖然留下了很多文字，卻不是詩人、文學家，也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官員，事實上我們無法將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隨便地貼上一個標籤，歸入某類人的行列。歷史研究中常用的類型化的分析在這裡是行不通的。正如作者所說，劉大鵬這個人物既是典型的、又不是典型的。作者在一開始說，本書的部份目的正是要反思我們傳統上應用於中國社會的分類：士紳、商人、農民、精英等等。當我們在運用這些概念的時候，我們到底是在指什麼？難道一個人（更不用說是一個家庭）只適用於一種分類嗎？如果身份是多樣的、會轉化的，那麼這對於我們的歷史敘述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最後我們看到，她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所採取的方法其實既傳達了一種理念的更新，也提供了一種敘事的寫作模式。她始終將劉大鵬作爲一個在大時代變動和小環境制約下生存的個體，在對他以及他周邊的人的日常生活、觀念的描述中展現了人物的個性、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變中經歷的種種情境以及人們在這種轉變中的無奈。以敘述爲主的寫作方法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鋪陳，但卻對一些中國研究中根本性的問題進行了思考和回應。例如，儒教在近代中國的命運，以及它在人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推動的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城鄉分離和整個地方社會空間格局、權力結構的轉變等等，都通過作者對劉大鵬的生活世界的生動描述展現出來。如果說有什麼缺漏的話，我想對於一個以漢語爲母語的讀者來說，我還是更習慣於在書後看到有一個英漢術語表。

杜正貞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